

陈美兰文集

1

陈美兰

著



古人云：
石本无火，
相碰方生灵光；
水尚无华，
相荡方显涟漪。

不同文化的交流、

碰撞，

不仅大大扩展

我们视野的边界，

更会激起

我们情感的震荡，

智慧的飞扬。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陈美兰 著

陈美兰文集

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美兰文集:全3册/陈美兰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2

芳草文库

ISBN 978-7-307-12538-4

I .陈… II .陈…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06.7-53 ②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86677 号

责任编辑:荣 虹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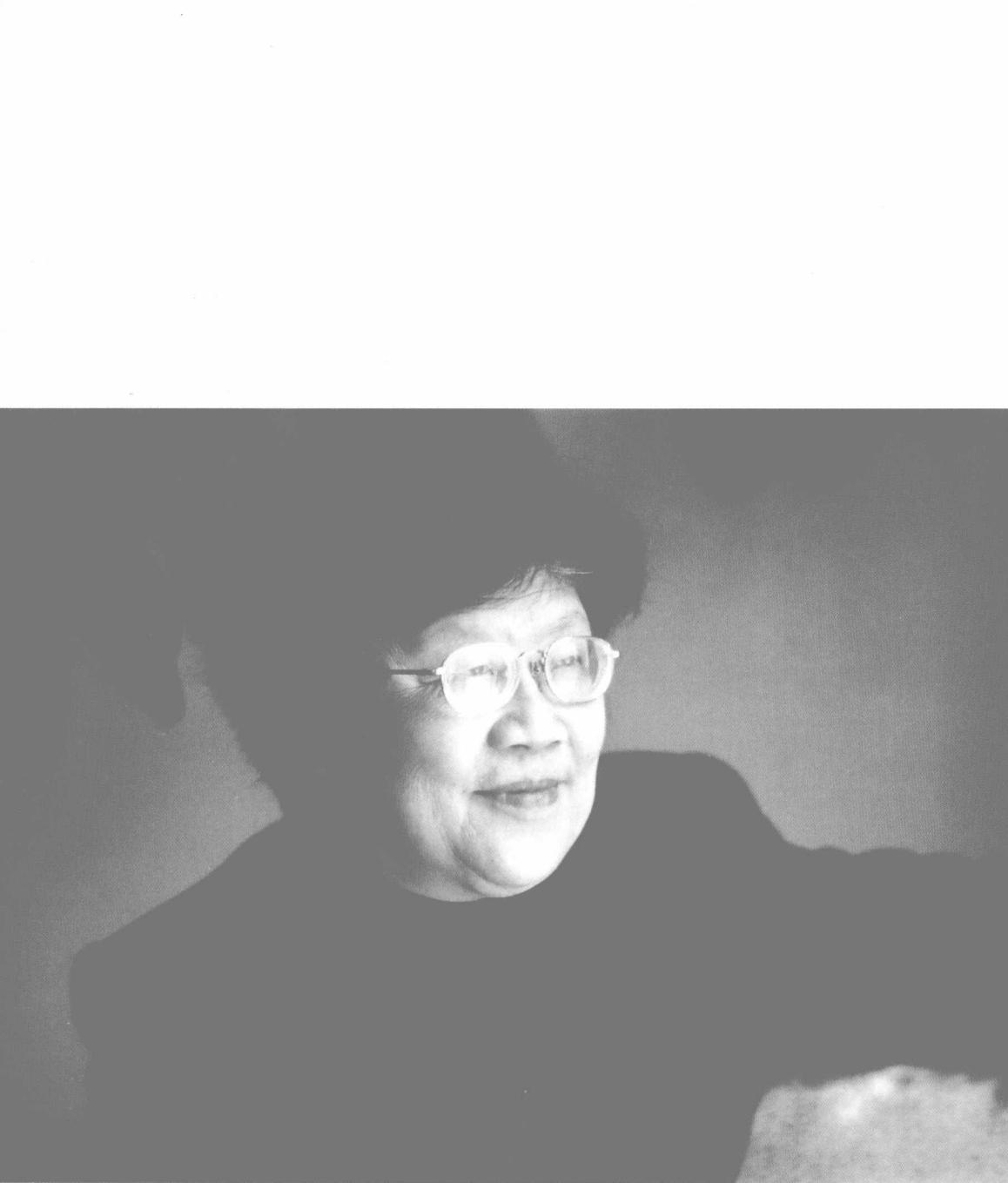
印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55.75 字数: 1019 千字 插页: 6

版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2538-4 定价: 132.00 元(全 3 册)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芳草文库》序

刘醒龙

武汉有一批年纪不算太老，但肯定不再年轻的作家，既往作品每出无不风行江汉，后来平淡了些。二〇一五年初，恰逢一场小聚，其间有老朋友提议给这些在文学创作上颇有成就的作家出版文集，且当场做出关键决策。老朋友提及的作家也是我的朋友，他们的处境很有代表性。

世事流逝到今天，说一点不残酷是不真实的，说太残酷似乎也不科学。值此宁翔雁前羞跟牛后世风，普天下之莫不借口追求日新月异，其实是乡下俗语说的，人人都想一锄头挖出一口井。宁肯臭名远播，哪管丑态百出。忘却不该忘却的，强化不该强化的，是世情中一大不敬。这几年为一位已故作家出版文集，好不容易才成，一来二往之间，见识了足够多的现世生态。似这等才华出众的作家，若非上苍失察，弃之英年，敢不是当今文坛大旗一帜？同理，那些在喧嚣背后悄然尘封的作品，谁能说不是日后人有所诵的典范？天地同根，不是没有高下之分，而是天有天的高度，地有地的厚重。

常住武汉三镇之人，最能体会大江东去、流水落花深意。也是体恤的缘故，又于旷野之间留下高山流水千古知音，以为勉励，兼作念想。朋友提议，饱含诗情，深藏灵性。没有太多商量，三言两语之间，就达成共识，以《芳草》杂志名义，逐年排选，将这批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编成文集出版。只是由于执业所限，本套书只能以《芳草文库》相称，名头虽小，相信分量不轻。

哲学教会人们认知正确与错误，自然科学是要让人懂得成功与失败。然而，短短人生，包罗万象，其善其美，何止兴衰胜败！文学的存世与流传，其意义正是超然前二者，不以成败对错为目的，也不以卑微尊贵定价值。人非草木，却如同草木，这是文学理由之一，生命不能永恒，却绝对永恒，这是文学理由之二。文学根本理由是，协助芸芸众生在庞杂得无可把握的宇宙间，在神与鬼、灵与欲、虚与实等一切冲突与对立之间，寻找适合每一个体的美妙平衡。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五日

总 目 录

卷一

- | | |
|----------------|-------|
|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 | / 1 |
| 近百年中国长篇小说的现代演进 | / 177 |

卷二

- | | |
|----------------------------|-------|
| 为追求学理性而执着前行
——在当代文学研究路上 | / 271 |
| 文学思潮篇 | / 281 |
| 长篇小说评论 | / 397 |
| 散点评析 | / 533 |

卷三

- | | |
|-------------|-------|
| 散文 随笔 | / 591 |
| 访谈与对话 | / 695 |
| 序言 | / 761 |
| 口述史 | / 811 |
| 《中国当代文学史》节选 | / 823 |

卷一 目录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

序	冯 牧 / 3
引言：历史的潮汐	/ 8
第一章 创作的演进	/ 16
第二章 折射力的寻求	/ 46
第三章 形象世界	/ 79
第四章 理性王国	/ 126
结束语：未尽的波涛	/ 161
后记	/ 164
编余絮语	张有煌 / 166
附录	
毅力、深思和突破 ——评陈美兰著《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	洁 淇 / 169
读《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	江晓天 / 173

近百年中国长篇小说的现代演进

第一章 晚清小说的“现代”辨析	/ 179
第二章 历史跨越：长篇小说在“蹒跚”中迈步	/ 197
第三章 “奠基性”年代：长篇小说在熔铸中的创建	/ 210
第四章 创作视域的拓展与现代精神的显现	/ 227
第五章 现代演进中“古典”倾向的回旋	/ 247
第六章 新的文化语境下长篇小说现代演进轮廓勾勒	/ 260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

序

冯 牧

我同本书作者只有数面之谋，在阅读这本别具机杼的著作之前，只阅读过她散见于一些报刊上的几篇主要是以剖析我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发展规律为主旨的评论文章。虽然我有幸和她共同参与过几次学术活动（主要是评奖文学新作的活动），有过一些思想和观念上的接触，从她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学者气度，但我对于这位近年来以自己在文学研究与评论工作上的辛勤劳作而引人瞩目的女批评家的学术成就和理论造诣，不能说有很多的了解，更不用说有广泛而确切的理解了。然而，我还是愿意在这本著作问世的时候，讲一点也许只能被看作赘言的粗略感想。

理由其实是很单纯的，因为我认为这是一本具有开拓性和建设性意义的著作。作为一位女评论家，她做了一项无论对于作家还是对于读者都是迫切需要却很少有人着手进行的有益的工作。

我国的新文学（我指的是主要在人类先进世界观指引和影响下的新文学），已经走过了七十多年的艰辛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被大家约定俗成地当成当代文学的文学事业，也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实践走过了四十多年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

不论是七十年还是四十年，有个确切无疑的事实恐怕是不容无视也不应低估的，这就是：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文学现象，这种文学现象开始被称为新文学或进步文学，其后又被称为人民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在这个文学领域里，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艺术家，他们以自己不同程度的对社会生活的洞察能力和对艺术形象的创造能力，为正在饥渴于精神食粮的中国读者奉献了一大批既鲜明又复杂、既是博大浩繁又是色彩驳杂的文学成果。这些成果，不论你怎么评价，都不能抹杀这样的事实：这些文学现象，七十年来或四十年来，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发展与变革，对于亿万人民的思想、情感、道德以及文化素质的形成与演变，都产生了广泛而又持久的影响。

这些作品及其作者，随着中国历史和人民解放与建设事业的急剧发展，日益明确和自觉地展现了以往的文学所不具备的特质，即把自己的生活观照和创作实践，同亿万人民所进行宏伟壮丽而又艰巨繁杂的解放与变革事业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使自己成为中国历史进步的长河中的脉搏相通、步伐一致的组成部分。

我们应当以我们的文学所逐渐取得的这种重要历史地位而自豪，而不应像某些非历史主义者那样，不愿意把文学现象放在本国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加以考虑，而总是热衷于以某种外国的创作规范为标准，习惯于以盲目的自薄乃至自卑的、近于虚无主义的态度来看待生长于祖国深厚民族土壤之上的文学现象。

我这样讲，决不是认为我们的评论家和研究家的工作可以在这样的判断的前提下止步不前。我只是想强调：我们应当用历史的和美学的眼光和标准，来看待我们已经出现的并且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思想影响的文学现象，把它们置于一定的历史地位上加以审视和观照，进而考察和剖析它们在思想、艺术上的得失、美丑、高下和精粗，以此沟通作家与批评家之间、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思想交流，使他们能够从不同角度上获得教益。而不应当以偏执、轻率的态度，妄自菲薄乃至厚诬一切民族传统的态度，来对待前人辛勤耕耘所取得的精神成果。这些精神成果，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不管其中还存在多少值得扬弃的缺陷和值得记取的教训，它们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积累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应当不断站在新的思想高度来回顾和总结历史，重新修订和改进我们的文学史的编写，但是我们无权在无视历史和否定历史的偏见支配下任意改写历史。

基于这种看法，我长久以来总是怀有这样的期望：有更多的既有坚定的理想又有卓越的才识，既有强烈的激情又有冷静客观的科学思维能力的文学评论家，能够把他们关注与精力，投入到长期以来、特别是四十年来我国所出现重要文学现象及其艺术规律的整体、系统、全面的研究和探讨工作方面来。这种工作可以从不同的范围、不同的角度和方位来进行。比如，可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学创作的总体现象、总体趋向(包括在此期间的创造性成果及其历史局限)所取得的新鲜经验以及值得深思的艺术教训等方面为考察对象，进行全面的深入的解剖；也可以以文学领域某些具有独自特征的创作方面(比如小说、诗歌、戏剧创作等不同门类)的特殊规律和经验为对象，进行细致入微的探索。不论从何种范围和方面来进行分析与研究，它们都是工作量相当繁重而艰巨的课题。而任何一个严肃的研究家和评论家，想要完成这样的课题，都需要有追求真理和坚持真理所必不可少的坚定精神、理论勇气和独立思考的能力，都需要使自己具备渊博的学识和先进的科学方法来作为思想武装，都要具有优秀批评家应有的敏锐

的审美观点和广阔的艺术胸怀。

要做到这一切，我认为是很不容易的事。因此，我珍视与赞赏在这些方面的一切严肃的、实事求是而非武断褊狭的尝试与实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陈美兰同志的这本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饶有兴味、引人思考并有助于人们更深一层地了解和判断我国当代文学一些重要现象及其内在规律的新观点、新论断和思想材料。

陈美兰同志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篇小说创作所进行的探讨，在角度取向上和剖析方法上是颇具特色的。她通过五个方面(或五个层次)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研究所得：第一，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历史基点、历史演变及其特殊背景与特点；第二，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情势和演进轨迹以及同时代背景、社会思潮的关系；第三，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在折射时代、反映不断变革的社会生活方面的艺术观念和思维方式，以及这些思维方式因时代与社会因素的制约所产生的矛盾、困扰和历史局限；第四，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形象(典型形象)的综论和具体透视，它们的历史的、美学的价值和艺术上的成败得失；第五，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历史进程中理性(历史意义、社会意识等)所起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哲学观对小说创作和作家的关键意义。

我不知上面所作的简略概述，是否能够准确地(或大致无误地)表达了这本著作的主要内容。我的直觉的感受是，在上述几个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方面，作者确实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而且表现了她作为一位评论家所具有的概括能力、思辨能力和审美能力。她以对于四十年来大量涌现的长篇作品的总体把握为基础(看得出来，在阅读这些浩如烟海的宏篇巨制上她付出了多么大的精力)，对作为叙事文学的最重要门类的当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规律及其得失，进行了既尊重历史规律，又重视艺术规律的探讨。她似乎比较热衷于和更熟悉于从史的纵向角度来考察不同时期长篇小说创作所提供的、永远值得我们珍视和肯定的成果与教训。同时，对于与日俱增的最新成就和新鲜经验也给予了同样细致的广泛的关注，力求从横向的比较研究的角度，把不断出现的许多新的文学现象，同历史沿革综合地加以考察。她重视总体规律的寻觅，也重视富有独特个性的具体现象的剖析，努力把宏观的和微观的分析加以综合和归纳，从中找出那些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共同规律和具有独特性的审美特征来。应当说，本书在这些方面常常有一些引人深思的新鲜见地。但我也要说，她的有些论断的明晰和准确，无疑会得到许多人的赞同；有些论断，也许还有待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的进一步的检验；而另一些论断，则是属于批评家基于自己的艺术主张而提出的独有见解，对于这些见解，无论对作家还是对读者来说，都不必要求迅速取得“认同”的反应。我以为，

对于艺术见解，不论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或是持有异议，这些都是属于学术见解的范围，应当允许甚至只能通过不同观点的争鸣，来使一些属于艺术与学术范畴的问题愈辩愈明、愈辩愈深。

作者在本书中或是其他论著中都明确地表明过，她是力求用“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方法来进行艺术探讨工作的。我的印象是，她对研究对象的总体把握方面和对许多具体现象的剖析方面，确实是努力在这样做，而且是在前人还很少涉足的领域中这样做的。我认为，她在不少问题的探讨上提出了一些无疑是可取的独创性见解。这些见解，肯定会在关心小说创作的作家和读者中产生共鸣，使他们得到启迪。但是同时，我们也不应当要求作家和读者对她所阐发的一切论点都会立即欣然首肯和取得共识。更重要的是，要看她在自己从事的工作范围内是否提出了建立在充分把握材料和科学分析基础上的真知灼见，是否对这些领域的探讨工作比起前人来做到了有所增益，有所深入，有所前进。

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作者在本书中所进行的有关长篇小说发展规律所进行的探讨，是具有一定的开创精神的。我从本书中获得了不少有助于扩展自己的思维视角的启发，其中不少颇富胆识的论断引起了我进一步探索的兴趣。但我也应当坦率地说，对于书中某些属于作者独立思考所取得的见解，同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学创作所作的思考和持有的观点有时也不尽相同。对此，我的态度是，我不一定会欣然同意你的某些意见，但我尊重你的严肃探求所取得的成果。有些饶有兴趣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讨论、商榷而求得更加充分有力、更有普遍说服力的论证。比如，我同意作者在分析长篇创作所出现的缺陷与不足时所提出的许多看法，但对于所谓“阴阳两面的思维定势”和“一体两极的艺术模式”这类提法就颇感困惑，我并不认为这是确切的、具有广泛概括性的科学论断。至少，作为理论概括，这两种类乎公式的提法，同我对于某些佳作或瑕瑜互见之作的感受和理解，是很难做到全然吻合的。我总认为，任何一部产生过比较广泛、比较深远影响的文艺作品，它的本身(包括它的精华和失误)都是既丰富又复杂的；“一体两极”也好，“阴阳两面”也好，也许可以恰当地概况某一部作品的得失，却未必适应于总体或大量文学现象的产生与得失。我始终认为，对于任何作品，只能用历史的、美学的观点，尊重社会实践和生活实践，对具体状况作具体分析；想要找出一两种带有一定概括性的“公式”来衡量大量的文学现象，不仅不能经常奏效，而且往往会出现某种始料所未及的“削足适履”的效果。在这里，我当然不是想贬低对文学艺术规律的总体性、概括性探讨的重大作用(相反，它的重要意义，我在前面已一再提到过了)，只不过是想再强调一下求实精神和辩证方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对这一点，我发现，尽管还不能说是

无瑕可寻和无懈可击，本书作者确实是力求在全书中努力地加以贯彻的。

总之，我认为，作为学者与批评家的陈美兰同志所完成的，是一项极有意义的、肯定会产生积极影响的工作。这是一本对于作家和读者、对于当代文学研究工作都将大有裨益的著作。

1991年1月24日

引言：历史的潮汐

一提起壮阔的大海，人们自然首先想到它那汹涌的波涛，飞溅的浪花，想起它无畏地呼啸着、腾跃着以排山劈岭之力向你阵阵迫来的气势。然而，大海也有平静的时刻。当你在海潮涌退的间隙漫步海边，就会发现面前的大海是那样的幽深悠远，那样令人心旷神怡，引发你无尽的情思。

我们这里面临的研究领域——长篇小说，又何尝不像浩瀚的大海呢？这个全面地汇聚作家的智慧和才情的领地，这个集中地显露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学威势的苑境，它具有大海的广阔涵量，也具有自己潮涨潮落的悠远历史。这样，在开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长篇小说的创作大潮进行总体观照之前，不妨就让我们站在那个平静的间隙中，对着已有久远历史的烟波浩渺的小说海洋，追寻一下它那辉煌而又喧闹的过去吧。这会使我们对今天新的浪潮的探讨，获得一个坚实的历史基点。

一些西方学者曾经饶有兴味地指出：中国长篇白话小说的兴起几乎和欧洲同时，都在 16—18 世纪之间。这是文学史上一个很有兴趣的共同点。^① 这里，不妨就从这个有趣的问题出发，以中西方的文学现象相互参照，看看中国长篇小说的渊源和发展的特点。

中国长篇小说的萌芽阶段，可以追溯到更加久远。中国小说从志怪发展到唐传奇，基本上属于文言短篇小说。到了十一二世纪的宋代，陆续兴起了“说话”这种艺术形式，它在当时流行的各种民间伎艺中影响广泛，拥有众多的听众与欣赏者。据南宋灌园耐得翁的《都城纪胜》记载：“说话”有四家，即“小说”“说经”“说史”“合生”。除讲宗教故事、演说佛书的“说经”和由两人演出、一人指物为题、一人应命成咏的“合生”外，“小说”是指有说有唱，专门演述短篇故事的形式，而“说史”（又称“讲史”）则是只说不唱，演述的都是长篇历史故事。研究长篇小说，是不能不重视“讲史”这种形式的出现的。

在“讲史”基础上形成的讲史话本，尽管语言上还不够纯熟，文白夹杂，结

^① 参见 A. 普拉克斯主编：《中国叙事文学》。

构也较零散，但它确已初具长篇小说的规模。它把复杂的历史事件敷衍成长篇故事，艺术手法上既从史传文学又从民间文艺中吸取营养，为以后的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奠定了最早的基础，创造了初步的经验。可以说，它就是我国长篇小说的胚胎。如果遥望一下西方的上古文学史，就会发现，也就在我国的宋元之际，十二三世纪间，也有一种文学样式逐渐取代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史诗，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谓的“骑士文学”。西方骑士文学的中心主题与中国的“讲史”有所不同，它似乎不那么专注于历代邦国的兴亡、朝代的更迭，而往往以一两个骑士为中心人物，写他们为爱情、荣誉、宗教而到处甘冒风险，作品充满浪漫的情调。但在形式上，两者却极为相似，都是叙述一个长篇的故事，具有曲折的情节、众多的人物和各种生活场面。骑士文学实际上也初步具备了近代长篇小说的规模。正如别林斯基所说的：“固然，这长篇小说是骑士风的，空想的，是曾有的和未曾有的事物、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事物的混合，可是这已经不是长诗了，里面成长着真正的长篇小说的种子。”^①

中西方长篇小说的萌芽期大致相近，当然不仅是种有趣的偶然现象，而是自有其必具的原因。从文学发展的自身要求来说，它需要不断扩大自己反映生活的形式和规模，这是必然的趋向，这点毋须多言。值得注意的倒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中西方经济、文化背景。西欧各国从十一二世纪起，封建社会进入全盛时期，由于手工业同农业有了分工，商业开始获得发展，城市陆续出现，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市民阶层和城市文化。处在这一历史阶段的我国宋代社会，也有相似的情况，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扩大，使各种民间技艺都向城镇汇合，为艺术的综合、融汇趋势提供了客观物质条件，而市民阶层纷繁复杂的生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新的文化要求，也为一种更大规模的文学样式的出现创造了主观精神条件。这恐怕是中西方长篇小说萌芽的一种共同依据，这是由相似的经济、文化历史背景所形成的。

然而，还需要进一步看到，尽管中西方长篇小说萌芽的时间大体相近，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这种对应的平行状态却很快被打破了，数百年来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自有特殊的起伏特点。这里不妨继续把西方小说作为参照系，来审视一下这种起伏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也许从中可以获得某种有意义的启示。中国长篇小说在宋代萌芽以后，开始的四五百年的发展较之西方小说更为迅速。14世纪末叶，即我国的元末明初，就出现了著名的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这

^① 《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第1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1964年版。

是由罗贯中在民间传说及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吸收了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写作而成的我国第一部具有完整意义的长篇小说。^① 这部小说取材于重大历史事件，具有宏大的艺术结构，全书出现四百多个人物，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艺术形象，显示了我国长篇小说创作起步的非凡气势。而在西方，在骑士文学出现后，长篇小说形态并没有太大的发展。倒是在14世纪中叶，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② 开了欧洲近代短篇小说的先河，而长篇小说创作一直到16世纪上半叶才出现了像法国拉伯雷的《巨人传》这样的巨著。^③ 这部规模巨大的作品以五卷的宏大篇幅写了祖孙三代“巨人”，通过他们的出生、教育、游历及文治武功，歌颂了人的巨大力量。尽管小说还缺乏严密的结构和集中的故事线索，但它毕竟代表西方长篇小说发展中的第一个重要收获。而这比我国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晚了一百多年。

标志着欧洲长篇小说发展新阶段的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它出现在17世纪初(第一部，1605年，第二部，1615年)。小说通过堂吉诃德主仆的“游侠史”，反映了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西班牙广阔的社会现实，无情地嘲讽了荒唐而又反动的骑士理想和骑士制度。作品的情节复杂丰富，在切近现实的生活背景上出现的近七百个人物都被有机地组织进基本情节中，体现出作家卓越的艺术构思力。小说更为突出的贡献是，开始注意着力塑造艺术典型。堂吉诃德和桑丘这两个富有鲜明个性又涵括深刻历史内容的典型形象，不仅对欧洲，而且对世界长篇小说的发展都有启发意义。但是，在认识这个事实的同时，却不应该忽略，几乎就在《堂吉诃德》诞生的年代，中国的长篇小说又往前跨越了一个新阶段。它的标志就是《金瓶梅》的出现。^④

《金瓶梅》的诞生在中国长篇小说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同此前出现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等小说的不同，在于它是由文人独立创作的第一部小说，这在我国古典长篇小说发展中是有重要意义的，它使长篇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摆脱了宋元以来流传的对话本的依附性，而

^① 现存《三国志演义》的最早版本是明嘉靖元年(1522年)刊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分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一般认为这是比较接近罗贯中原著的本子。文学史家对此早有定论。

^② 创作于(1348—1353年)。

^③ 1532年发表第一部《巨人卡冈都亚之子，狄波沙德王，十分有名的庞大固埃的可怖而骇人听闻的事迹与勋业记》，1534年发表第二部《庞大固埃之父、巨人卡冈都亚十分骇人听闻的传记》，1545年发表第三部《善良的庞大固埃的英雄言行第三卷》，1552年发表第四部。中译本书名为《巨人传》。

^④ 据文学史家考证：《金瓶梅》产生的时代大约是1568—1602年，即明代隆庆二年至万历三十年之间。这同《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现的时间大致相同。